



大学用书

古诗文要籍叙录

金开诚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大学用书

古诗文要籍叙录

金开诚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诗文要籍叙录/金开诚,葛兆光著.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2012.4
(大学用书)
ISBN 978-7-101-08591-4

I. 古… II. ①金…②葛…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739号

-
- 书 名 古诗文要籍叙录
著 者 金开诚 葛兆光
丛 书 名 大学用书
责任编辑 王传龙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2版
2012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 规 格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9 $\frac{1}{8}$ 插页 2 字数 564千字
- 印 数 4001-10000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91-4
- 定 价 39.00元
-

再版序言

葛兆光

一

这部《古诗文要籍叙录》原名《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是当年我和金开诚先生合作的旧著，1988年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现在十七八年过去，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已经很难找了。因此，中华书局要重印，重印前，让我写一篇再版序言。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回想起当年查找版本、考索文献、写作叙录的种种辛苦，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写这部书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现在想起来，古典文献仿佛是一个枯燥的专业，不过，对于一个耽误十年才有机会读书的人来说，这个机会却是很珍贵的。每天在故纸堆里，没有觉得丝毫的辛劳，相反，倒是从已经如烟的往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历史隐情，于是乐此不疲。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好，我们学生的十个普通借书卡，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即使是到善本部去看书，虽然不能随便借回去，但不管孤本还是抄本，大体上倒也都能让人亲手翻阅。现在恐怕再也没有这样便利的图书条件了。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写这部关于文学古典的书，尽管二十多年后的知识和阅历已经见长，但精力却远不如昔；即使精力依旧，恐怕也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图书条件。记得那时，我每次从图书馆借了几函古书回到宿舍，便在日光灯下，拿了尺子比着，一行一行地读，隔了几天，把这些看完的书还回去，再借若干，日复一日做着同样

的事情。

当时，金开诚先生在古典文献专业给本科大学生开一门课，名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主要是讲文学古籍的一般情况，因为一直没有教材，所以总想编一本给学生参考。我是他指导的研究生，这一设想由他提出，但具体撰写的事情便落在我的头上。原本，金开诚先生有一个简略的讲义，并不很繁琐和复杂，选的书目也不算多，他只是想让我在讲义基础上稍加添补增删。可是，那时我多少有一些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彻底重做，于是便拟定了一个书目，一一在图书馆按图索骥，从古典成书的经过，到版本的流传系统，从注释体例的好坏，到注释是否准确，从收录是否遗缺，到内容是否有伪，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不分春夏秋冬，我穿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的北图分馆之间，也曾经到过北师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近乎刻板的工作流程，先是翻检图书馆的卡片柜确定现存诸本，查阅大批藏书目录确定曾经流传的版本，借阅最典型和最容易到手的版本来对比，最后抽取若干卷的文字、注释，与可以对勘的各种资料来考察，这些繁琐的工作占去了大半时间。不知为什么，现在记忆中留下的断片，除了夏热冬寒，挤车艰难之外，总有柏林寺分馆图书卡片柜里让人打喷嚏的灰尘，有在北京图书馆对面朝鲜冷面馆门口蹲着吃面的情景，有在黄得发脆的旧书中发现资料的喜悦。

二

这部书选择和叙述的，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百二十种最重要的诗词和散文的总集(包括选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本来还想把小说、戏曲也一并讨论，后来摊子铺得太大，越写到后来越力不从心，才只好作罢)。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的体例，第一是梳理这些文献的成书、刊

刻、流传，第二是考察这些总集、别集和诗文评的内容缺佚和真伪，第三是讨论它的选本和注本优劣。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不免要在古书堆里花大量时间反复翻检比对。

日复一日地查对、比照、阅读，总是有一些发现，也有一些心得，这些大大小小的心得被写在了这部书里。举几方面的例子：

在关于文学古籍的成书方面。如对《全唐文》所据底本的考证，我从清代人的文集和笔记中，证明清代官修《全唐文》，是因为用了陈邦彦的旧本《唐文》，才能如此速成，这一结论好像至今还被学界引用；又如在对比《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以及各种笔记中宋人所引所传《河岳英灵集》佚文中，发现今本《河岳英灵集》应当是殷璠天宝十二载的二次重编本，因此评论、选录、小传，都与天宝四载初编本已经有差异，反映了天宝四载以后的八年间，殷璠以及当时人对诗歌和诗人评价的变化。可是现在人讨论殷璠，却多据后来的传本，这一点却至今还没有人特别注意；再如考证杜牧最成问题的《续别集》，我曾经引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和《文苑英华》彭叔夏、周必大校勘记及清代《居易录》，指出今天的杜集之所以混入相当多的许浑诗，可能问题就出在宋代所刻的这个《续别集》上，而这个《续别集》由于被收入《全唐诗》，所以才造成了很多麻烦。

在对古籍的对比校勘方面。比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韦苏州集》，我在书中曾经指出它虽然屡经补辑，但诸本仍误收了他人的几首诗，但又漏收了《文苑英华》所载的《春雪》、《龙潭》、《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等三首；又如，我曾以《中州集》、《元文类》与金元两代各种文集的对校，指出原来以为颇全颇精的《澄水集》、《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公全集》、《道园学古录》中，其实有不少文字之误和收录缺遗，这反而证明这两个总集和选集的版本价值。记得当时在撰写各种宋金元别集时，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总集选集以及《永乐大典》、各种笔记、各种类书大体翻检过，所以，常常在讨论传世各种别集时一一对比。因而，很多现存别集缺收的遗文逸诗，像范成大《石湖集》、赵秉文《澄水集》、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刘因《静修集》、萨都刺《雁门集》等等，我都可以有所举证，这也许对研究这些文学家的人有所助益。

在关于注释的讨论方面。我曾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旧注，也仔细地抽查了一些古人的注释，发现古注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穿凿附会地解释背景，像我在书中指出蒋师煊注释阮籍诗时对历史的穿凿附会，冯浩对李商隐感兴咏怀诗中牛、李党争背景的刻意求索，姚文燮注李贺诗对政治影射的迂曲说解；二是不管具体语境，一律照字面相似引证，因而不能准确解释字义，像书中说到的蒋清翊注王勃《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四句，姚文燮注李贺《塞下曲》之“席羈”，方世举注韩愈《山石》诗之“犖确”，陈元龙注周邦彦《琐窗寒》之“剪烛西窗”等等。这些都是用了很仔细的排纂对照的功夫一一发掘出来的例证，也许对于古注的理解会有好处。不过，也许是当年好胜逞强的缘故罢，对于各种注本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批评，像对著名的赵殿成注王维诗《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中的“七圣”之误、王琦注李白诗《思边》中的“西山”之误、王嗣奭注杜甫《绝句》中的“西岭”之误等等，多少都要进行一些批评，直到几年以后我自己选注唐诗的时候，爬梳检寻，反复推敲，才知道注释之难，因而也对当年过度苛刻的评价标准有了一些反省和检讨。

可当时总觉得不能人云亦云，总觉得要说一些自家的东西，所以很努力地阅读和发掘。于是，虽然书中也参考也依傍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但毕竟也有不少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发现。比如关于宋代《茗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的生平，就是我自己从各种地方志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清人萨龙光对于萨都刺生平的编年，就是我自己钩辑资料来驳正的。这种发现的惊讶常常有，在对每一种书的细心阅读中，常常会让我产生莫名的错愕，因为有些听上去名气很大的著作，却常常会有常识上的毛病，一些平常不会产生疑问的地方，却在仔细地比中对中看出了错误，而稍稍深入追问，却能发现很多蹊跷。再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全金元词》收录、校勘和小传的疏漏，像新影印本《宋诗别裁集》作者介绍的张冠李戴等等，真的让人觉得奇怪。至于在阅读比中对中发现古人注释

的错误，古籍中的误收和漏收，编纂体例的混乱，更是不胜枚举。这倒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三

尽管很久以来，我的兴趣转向了禅宗史、道教史和思想史研究，没有再做这样的文献研究，不过，在读研究生期间，这一次和金开诚先生合作进行古代诗文典籍的考察和研究，却成了我后来做学问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读前四史，做中国史学史）。曾有老一辈学者告诉我说，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只要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是来自经学的训练，还是来自二十四史，是打了《说文》的基础，还是读透了《四库全书总目》，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打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后来做《唐诗选注》也好，做《中国思想史》也好，就得益于这种阅读大量文集的经验，至今，当年为查找资料而收集的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各种目录及其索书号，当年在图书馆里翻书抄录的卡片资料，还时时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常见的文献，它就好像是潜藏在记忆体里的资源，在激活的时候可以重新浮出水面。

年纪大了，回想起来，发现学古典文献专业还真有它的意义。据说，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特意设置、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现在已经面临危机。也许学生觉得那些故纸堆很枯燥乏味，爬梳半天也未必有一点发现，缺乏激情更没有吸引力，远不如电视电影来得“爽”，甚至比不过诗歌小说能够宣泄和轰动。确实，就连当年我在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被临近专业的同学善意地称为“出土文物”，也确实不及他们容易显露天才与展示抱负，一首诗歌就能传遍校园，一篇小说就让人红了半个中国。不过，学问的事情却不能用刺激和感性的方式评价，“爽”的不一定有用，愉悦和知识是两回事。当年的古典文

献专业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魅力。就说那时上课的阵容吧,用现在的话说是明星云集,周祖谟先生讲音韵,读到老杜“几回轻泻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时仰面呵呵一笑的情景,至今仍然清晰;阴法鲁先生讲《诗经》,稍稍弯腰、微带口音亲切地讲述,让人想起孔子杏坛讲学;裘锡圭先生那时还是中青年教授,他讲文字学,最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是他的不苟言笑。最是一门叫做“古代文化史常识”的课,至今想来,那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豪华队伍,邓广铭、史树青、侯仁之、刘乃和之外,当然还有本系德高望重的王力。

学知识仿佛牛吃草,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当年总觉得学校勤学,真是繁琐恒钉,要到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才知道这种比西方“细读”还“细读”的方法,实在是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也是到了阅历较多,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学问的事情,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倒像是马拉松,要到了后半程,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理解它常常需要时间。直到如今,我自己当了很久的教师,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常常劝说学生不要先学天马行空似的宏观研究,而让学生去做那些苦功夫和笨功夫。也许有的学生并不很情愿,但我也很苦恼,因为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原因,因为那只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

四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华书局让我来重新校订此书,有朋友询问,是否可以作一些修订,我觉得很为难。

的确,这里面有的知识已经过时,因为二十多年来对于文学古籍已经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萨都刺集》的版本和内容,当时也许还算考察比较仔细的,但在这部书出版后一两年,我就与张旭光先生合作重新写了一篇《萨都刺集版本考》,修订了这部书中的结论,而近年来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的一个学生,又以他的博士论文,再度修订了我们的结论。这种后出转精的例子太多。可是,现在金开诚先生没有精力来订补,我也没有时间来更正,只好一仍其旧;也有的典籍已经出版了新本^①,而我们二十年前列举和评论的版本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像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现在早已由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取代,吴之振编的《宋诗钞》,也已经远不如新编《全宋诗》,苏天爵《元文类》更是被新编六十册《全元文》所替代,《全唐诗》及其补辑,也早有了陈尚君的《补编》,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二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变化太多太快,我觉得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追踪、来更新。好在就这样保存当年的原状,虽然留存了一些当年的疏漏和讹误,但是,它既可以让人看到二十多年前人们依据文献的实况,也可以保留一份学术史资料。因此,在这次重印时,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文字修订,删去了一些文学史常识叙述,至于有关文献的部分则一仍其旧。

常常和朋友谈起,如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让人满意。原来从基本文献中爬梳资料重建古代文学历程的基本传统,好像现在不那么受人敬畏了,本来是入门的文学史教科书加上以嚼饭喂人的文学作品选,却好像成了现成的框架被人们方便地套用。特别是,三两个被翻译的舶来洋词,好像在很堂皇地指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路,而貌似新潮的那些汉学家的绕路说禅,原本只是避免古文献释读困难的借口,却仿佛成了金科玉律。最近,我看了一些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始终搞不明白,既然有这么丰富而生动的古代中国文学世界,为何

^① 编者按:为方便读者查检阅读,我们对近年出版的新整理本,以附注的形式作了提示,仅供参考。

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却如此狭窄而陈旧,好像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似的,所有的翻新出奇,似乎都靠着“乘坐概念和名词的纸飞机”,在想象的空中一边翻滚一边俯瞰,觉得这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更感到这种悬浮在古典文献之上,仅仅凭着教科书和作品选作为指南来寻找课题的风气,实在让人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在这样的时候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因此,在这部书再版之际,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这部可能读来很枯燥的旧书的再版序言。

2005年6月25日于蓝旗营寓所

目 录

再版序言	(1)
诗 经	(1)
楚 辞	(15)
玉台新咏	(32)
乐府诗集	(37)
古诗源	(43)
古谣谚	(47)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50)
唐人选唐诗(十种)	(56)
全唐诗	(70)
唐诗三百首	(75)
宋诗钞	(80)
中州集	(85)
元诗选	(90)
明诗综	(96)
晚晴簃诗汇	(101)
五朝诗别裁集	(105)
敦煌曲子词集	(114)
花间集	(118)
尊前集	(121)
花庵词选	(124)

绝妙好词	(129)
词 综	(134)
词 选	(139)
全宋词	(142)
全金元词	(148)
全清词钞	(152)
文 选	(156)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65)
文苑英华	(171)
唐文粹	(177)
全唐文	(181)
宋文鉴	(185)
南宋文范	(189)
金文最	(193)
元文类	(197)
明文衡	(201)
清文汇	(205)
古文观止	(209)
古文辞类纂	(214)
骈体文钞	(220)
曹操集	(224)
曹植集	(227)
阮籍集	(231)
嵇康集	(237)
陶渊明集	(242)
谢灵运集	(251)
鲍照集	(254)
谢朓集	(259)

江淹集	(263)
庾信集	(266)
王勃集	(273)
陈子昂集	(277)
孟浩然集	(280)
王维集	(284)
李白集	(293)
高适集	(305)
岑参集	(308)
杜甫集	(312)
韦应物集	(329)
韩愈集	(333)
柳宗元集	(342)
刘禹锡集	(349)
李贺集	(352)
白居易集	(360)
杜牧集	(366)
李商隐集	(372)
温庭筠集	(380)
李璟李煜集	(385)
王禹偁集	(388)
梅尧臣集	(392)
欧阳修集	(397)
苏舜钦集	(403)
王安石集	(406)
苏轼集	(414)
黄庭坚集	(426)
秦观集	(436)

周邦彦集	(439)
李清照集	(445)
陆游集	(449)
范成大集	(455)
杨万里集	(459)
辛弃疾集	(464)
姜夔集	(468)
元好问集	(472)
刘因集	(477)
赵孟頫集	(480)
揭傒斯集	(483)
萨都刺集	(486)
杨维禎集	(491)
宋濂集	(496)
刘基集	(500)
高启集	(503)
李攀龙集	(508)
王世贞集	(510)
归有光集	(513)
袁宏道集	(516)
钱谦益集	(520)
吴伟业集	(526)
朱彝尊集	(532)
王士禛集	(539)
纳兰性德集	(544)
方苞集	(546)
袁枚集	(549)
姚鼐集	(553)

龚自珍集	(555)
文心雕龙	(560)
诗 品	(568)
二十四诗品	(572)
诗话总龟	(577)
苕溪渔隐丛话	(580)
唐诗纪事	(583)
诗人玉屑	(587)
沧浪诗话	(590)
词 源	(593)
唐音癸签	(596)
带经堂诗话	(600)
宋诗纪事	(604)
随园诗话	(609)
白雨斋词话	(612)
人间词话	(615)
后 记	(619)

诗 经

《诗经》本来叫《诗》，又叫《诗三百篇》，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括三百零五篇诗；另有六篇有目无辞，叫做“笙诗”。有人说“笙诗”只是笙乐的名目，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也有人说“笙诗”是用笙伴奏的诗，本来是有辞的，后来失传了。究竟哪一种说法对，现在也不能确考。总之，《诗经》中实际存在着三百一十一个题目，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中的诗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编排起来的。其中《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等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小雅》和《大雅》，《小雅》实际是七十四篇，外加六个“笙诗”题目；《大雅》则有三十一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有三十一篇，《鲁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诗三百篇”本来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风”、“雅”、“颂”也就因乐调分类而得名：所谓“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也写作“夏”，是正的意思，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调，在周人看来这是“正声雅乐”（有别于各地的土风），而用这种乐调演唱的诗歌就归入“雅”的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收入这一部分的诗歌当然也用于祭祀；至于祭祀用的舞曲为什么叫做“颂”，则有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颂”通“镛”，“镛”是大钟，这种舞曲因为用大钟伴奏所以叫“颂”；另一种解释是“颂”有形容的意思，这种舞曲因为用来形容赞美祖宗的功德，所以叫“颂”。这些解释都可供参考。

《诗经》中的诗，就其创作时间而言，早至西周初期，晚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就其产生的地域而言，涉及今陕西、